

程公說《春秋分記》的體例、 經解與史鑑*

康凱淋

提 要

宋代出現許多以新史體改編《春秋》經傳體例的著作，其中以程公說《春秋分記》的卷數最多，主題也最豐富，是一部完整的綜合性撰述，但學界較少關注體例改編的總體趨勢和學術意義，故本文嘗試開拓這類型的研究課題，聚焦程公說《春秋分記》的編纂體例、經解義法和史鑑寄寓。本文認為《春秋分記》以史體“紀傳體”多元地反映春秋歷史的面貌，足以作為研究《左傳》重要的參考依據。程公說雖以胡安國《春秋傳》為經解旨歸，但透過史體縮合深刻的經解義理，高度依附《左傳》，將麟經詮釋導向務實客觀的路線，與南宋捨傳從經的解經路徑有所不同。又能上承《春秋》“懲惡勸善”的史鑑精神，從其史事制度的沿革興變總結出歷史經驗，寓託不少垂訓警惕的史鑑觀點，形成一套獨有的內在理路與學術特色。

關鍵詞：《春秋》 《左傳》 程公說 紀傳體 史學

* 感謝審查教授惠賜寶貴意見，以及編輯人員細心校訂，使本文臻於完備。

一、前 言

目前關於兩宋《春秋》學的整體發展,北宋演變較受學界注意,也陸續有相關研究成果,已勾勒其中梗概,¹相形之下,南宋《春秋》學的進展面向較未得到學界重視。²而且在宋代《春秋》經傳的著作中,以注解經文、分析義理的形式居於主流,其他“專門化研究”的論著更是少見學者看重。趙伯雄《春秋學史》就認為宋代《春秋》學主流的著作是以探討和闡發經義為主,並提出專門化研究的性質和特點:

作者並非著眼於經義,而是對《春秋》經傳本身的一些專門性的問題進行探討,例如《春秋》中的地理問題,《春秋》中各國的世系年代問題,《春秋》經傳涉及的禮制問題,《春秋》災異問題,《春秋》經傳中所見占卜問題、人物稱名爵謚問題等等。還有一些學者對《春秋》經傳做史的改造,例如仿紀傳體史書諸體裁編撰《春秋》經傳的紀、傳、志、表,或者對《春秋》經傳中的紀事按類按事件重編等等,這類著作也屬於專門化的研究。這種研究學術性往往比較強,沒有什麼明顯的政治目的,只是對讀懂《春秋》、了解《春秋》深有裨益。³

-
- 1 例如侯步雲《北宋〈春秋〉學研究》提到北宋《春秋》學的幾項特點:《春秋》始終處於北宋學人的研究視野、有強烈的致用性、《春秋》與理學的互動關係經歷了由相對主動到相對被動的過程、理學家沒有完整的《春秋》類著作等,或是姜義泰《北宋〈春秋〉學的詮釋進路》從經典詮釋的角度,將此時期在詮釋方法上的進展劃分“沉潛期”、“變革期”、“多元探究期”三個階段。參見侯步雲:《北宋〈春秋〉學研究》(西安:西北大學歷史系博士論文,2009年),頁1—163。姜義泰:《北宋〈春秋〉學的詮釋進路》(臺北:臺灣大學中國文學所博士論文,2013年),頁1—485。
 - 2 張尚英將宋代《春秋》學專著成書時間劃分為四個階段,其中第四階段就是整個南宋(1127—1279)時期:“第四階段一百五十二年,共三百五十四部著作,二百四十六名作者,年均著作2.34部,年均作者1.63人,著作與作者數都有大幅度的增長,《春秋》學在這一時期獲得了長足發展。”南宋著作數量雖多於北宋,但與學界研究的重視程度卻未成相同比例。見張尚英:《試論宋代〈春秋〉學的地域性與階段性》,《宋代文化研究》第22輯(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16年7月),頁194—203。
 - 3 趙伯雄:《春秋學史》(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04年),頁563。

對於這類著作有無明顯的政治目的，抑或貢獻是否只協助讀懂《春秋》，文中觀點可再商榷。但不爭的事實是，即使它們屬於宋代《春秋》學的支流，也仍然與主流交集，相互漫衍盤錯，形成樹狀共生的學術流域。

檢閱宋代《春秋》學“專門化研究”，其中以經傳體例改編的著作最多。李建軍《宋代〈春秋〉學與宋型文化》設立“《春秋》經傳體例的史學改編”一小節，列出改編為紀傳體、紀事本末體、國別體、圖譜表、類書體五個主題的著作，⁴其中以程公說《春秋分記》的卷帙最為浩繁。程公說，字伯剛，號克齋，南宋眉州丹稜人，居於叙之宣化，一生重要的教學活動或著述研究都在蜀地，曾習張栻（1133—1180）講論性理之說。⁵據其弟程公許《春秋分記序》所記：“先兄伯剛自童丱至強仕，殫思于《春秋》一書，不自覺其心力之耗。……每見其窮晝夜，廢食寢節，玩索探討，鈎纂竄易，前後積藁如山。”⁶可見積學苦志、窮研《春秋》的一面。著作也都與《春秋》相關：《春秋分記》九十卷、《左氏始終》三十六卷、《通例》二十卷、《比事》十卷，又取諸儒講解，鈎纂成編，名為《精義》，⁷但因庸醫誤治而死，享年三十七，⁸書未及成，今僅存《春秋分記》一書（以下簡稱《分記》）。

目前學界多站在讀者立場或研究效益肯定《分記》的價值，比方金生楊說：“《春秋分紀》（該書書名一作《春秋分紀》）一書條理分明，敘述典贍，不僅利於初學者檢索，而且對研究者探討《春秋》提供了不少方便。”⁹趙伯雄也是從讀者能藉此通盤地研究文獻，將它視為重要的中介資源。¹⁰這些觀點確實符合程

4 李建軍：《宋代〈春秋〉學與宋型文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年），頁362—372。

5 程公許《春秋分記序》曰：“兄之學，於《春秋》為專門。……宇文公正父從南軒最久，以學行著西南。兄事之期年，得南軒講論理性之說，益以茲事自任。”見程公說：《春秋分記》，《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冊154，頁5—6。

6 同上，頁5。

7 劉光祖：《程伯剛墓誌銘》，程公說：《春秋分記》，《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54，頁7。

8 嘉定元年（1208）十月，劉光祖《程伯剛墓誌銘》載：“賊平，而伯剛以積憂傷，且方奔避時失食飲節，忽忽病。醫誤投之藥，汗不止，遂死，開禧三年三月二十二日也，年三十有七。”同上，頁6。

9 金生楊：《理學與宋代巴蜀〈春秋〉學》，《四川師範大學學報》2006年第5期，頁136。

10 趙伯雄：《春秋學史》，頁565。

公說《分記》的特色，畢竟它涉及的主題甚廣，勢必能提供讀者多元的參考素材。也由於《分記》一書的體例和性質，被歸類的主題單元較為特別，如在李建軍《宋代〈春秋〉學與宋型文化》是隸屬“宋代《春秋》經傳的史學詮釋”一章，趙伯雄《春秋學史》另立“《春秋》經傳的專門化研究”討論是書，張厚齊《〈春秋〉義法模式考述》則歸列在“《春秋》義法之緯史模式”之下的“圖表譜曆類”。可惜的是，《分記》在《春秋》學史或相關論文中皆非核心論述，大多搭配其他單元並附於文末集中說明或簡單敘說，迄今尚未有專文深入研究。有鑑於此，本文選擇程公說《春秋分記》為研究對象，嘗試開拓《春秋》經傳體例改編的研究課題。但因《春秋分記》賅括多面，難以在單篇論文的架構盡述每則篇章、主題，故本文先聚焦於是書的編纂體例，再分析箇中的經解義法和史鑑寄寓，適時點出較具代表的內容，呈現相關的知識型態與學術取向。¹¹

二、程公說《春秋分記》的編纂體例

南宋淳祐三年(1243)四月，游似《春秋分記序》點出程公說《春秋分記》和司馬遷《史記》的關係：“司馬子長始為紀、傳、表、書，革《左氏》編年之舊，踵為史者，咸祖述焉。近歲程君伯剛又取《左》書，釐而記之，一用司馬氏法。”¹²近現代學者皆循游似意見，謂《分記》採“紀傳體”的編輯體例，¹³但《春秋分記》並非按《史記》本紀、世家、表、書、列傳的分類，而是採年表、世譜/名譜、書、世本

11 據楊果霖考證，程公說《春秋分記》現存版本有清陽湖孫氏平津館鈔本、清南海孔氏嶽雪樓鈔本、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和各種清抄本、鈔本。雖然清陽湖孫氏平津館鈔本、清南海孔氏嶽雪樓鈔本卷帙完整，但部分字句模糊闕漏；而其他清抄本則卷數不齊，或有以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為底本者，故本文援引程公說《春秋分記》統一以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為主。見楊果霖：《〈經義考〉著錄“春秋類”典籍校訂與補正》（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13年），頁1057—1066。

12 程公說：《春秋分記》，《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54，頁3。

13 例如戴維說：“《春秋分記》在體例上依司馬遷《史記》，將《春秋左氏傳》改編成傳記體。……這也是繼承北宋改編《春秋》體例的路徑。”戴維：《春秋學史》（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4年），頁359。沈玉成、劉寧亦言：“程氏把《左傳》打散改編整理成為《史記》式的紀傳體，為閱讀《左傳》提供了很大的方便。”見沈玉成、劉寧：《春秋左傳學史稿》（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頁243。

四類分法，篇目主題也涉及曆法、疆域、五行、禮樂、征伐、政制、王事、諸侯等，隸屬一部綜合性撰述。宋代《春秋》學雖也有幾部與《分記》同為紀傳體，採用史遷之法的論著，但都已散失亡佚，¹⁴如此更能顯見程公說《分記》的重要性。以下先針對表、譜、書、世本四類，選擇代表篇章，分析每類的編纂形式，試圖展現程公說抄錄、彙集、哀輯《左傳》文本的不同面貌。

(一) 表

唐代之前較少以《春秋》為表，到了兩宋才逐漸出現年表、國表、人表或地表等著作。¹⁵《分記》中的“表”共九卷，包含《周天王內魯外諸侯年表》《王后年表》《內夫人年表》《內妾母年表》《王姬年表》《內女年表》《魯卿年表》《晉卿年表》《宋卿年表》《鄭卿年表》。雖以“年表”為名，但從其篇名如王后、王姬、魯卿、晉卿、宋卿等，也可見其兼及“人表”的內容。

對於紀傳體史書來說，“表”是獨立體裁，能彌補本紀、志、列傳的不足；但單就史表自身的特點而言，它能以圖表經緯的方式重新載錄編年相屬的事迹，行文樣式與規模就已不同，因此讀者開卷易於明晰人事。《分記》首篇《周天王內魯外諸侯年表》就以年表繩貫春秋華夷的動向，具備這類史表特色：

從下述年表來看，僖公四年以諸侯侵蔡、伐楚、侵陳為主，夷狄動向是楚國

-
- 14 例如唐闕《左史傳》一書，《紹興府志》就記載：“唐闕，字進道，山陰人，舉進士，歷都官員外郎，乾道間為浙東檢察，嘗以《左氏春秋》倣遷、固史例，以周為紀，列國為傳，又為表、志、贊，合五十一卷，號《左史傳》行於世。”沈括（1029—1093）也作《春秋左氏紀傳》，李燾（1115—1184）即評：“取丘明所著二書，用司馬遷《史記》法，君臣各為紀傳，凡欲觀某國之治亂，某人之臧否，其行事本末畢陳於前，不復錯見旁出，可省繙閱之勤。”以上引文分見朱彝尊撰，林慶彰等主編：《經義考新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卷188，頁3438；卷183，頁3361。此外，據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考》引黃庭堅語：“沈存中博極群書，至於《左氏春秋傳》、班固《漢書》，取之左右逢其原，真篤學之士也。”見馬端臨撰，上海師範大學古籍研究所、華東師範大學古籍研究所點校：《文獻通考》（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卷236，頁6439。可見沈括亦精於《左傳》與史學，可惜是書亦佚。
- 15 目前就《經義考》所錄，可查見兩宋仍有楊蘊《春秋年表》（存）、佚名《春秋十二國年曆》（佚）、楊彥齡《春秋左氏年表》（佚）、環中《左氏二十國年表》（佚）、韓璜《春秋人表》（佚）、環中《春秋列國臣子表》（佚）、張洽《春秋歷代郡縣地理沿革表》（佚），涵蓋年表、國表、人表或地表等主題。見朱彝尊撰，林慶彰等主編：《經義考新校》，卷177，頁3255；卷178，頁3281；卷180，頁3317；卷186，頁3406；卷189，頁3453。

部分事迹還會交代世變關鍵，¹⁷點明春秋局勢的變化。

《周天王內魯外諸侯年表》屬於以時繫事，而《王后年表》《內夫人年表》《內妾母年表》《王姬年表》《內女年表》《魯卿年表》《晉卿年表》《宋卿年表》《鄭卿年表》則是以人繫事，同樣可將參伍懸遠的人事統匯於圖表，經緯縱橫，有倫有脊。尤其是《魯卿年表》《晉卿年表》《宋卿年表》《鄭卿年表》詳載四國執政大夫的變化。《魯卿年表》與《鄭卿年表》按照諸卿名氏排列，《晉卿年表》與《宋卿年表》則以官制職位序列，因此諸卿權勢的分合狀況，抑或官制的更替變化都能鉅細靡遺。以《魯卿年表》文公前期的表格為例：

八年	七年	六年	五年	四年	三年	二年	文元年
齊魯為地四十二年魯公立其子懿	公孫敖如宋師不至而復內成	盟公孫敖如魯	公孫敖如晉			垂陘晉士穀盟于	公孫敖會魯于戚公孫敖如齊
				叔孫得臣會晉宋陳許鄭伐沈			叔孫得臣如京師
		季孫行父如陳又加晉行父公子友孫而無佚之子也					
于展	公子遂會晉隨盾盟于衡雍會雒成盟		公子遂如晉			納幣	公子遂如齊

圖二 程公說《春秋分記》《魯卿年表》¹⁸

17 例如《春秋》襄公二十七年宋之盟，《分記》於晉平公十二年的表格中注明：“晉、楚自此平。大夫盟。”或是周敬王八年一欄，晉頃公十四年之表格除了繫上“六月庚辰，頃公卒，子立”一事，另外標注“六卿自是大矣”。見程公說：《春秋分記》，《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54，頁38、42。

18 同上，頁55—56。

宋儒已點出魯僖公在位公子遂專政的情況,¹⁹而程公說除了表列公子遂如齊、如晉,也依序附上公孫敖、叔孫得臣、季孫行父與諸侯盟會,以及出使各國的內容,讀者可端見公子遂和其他大夫擅專、魯文公不能制臣之情勢,正如高閔所言:“文公三年之間,書公子遂、公孫敖、叔孫得臣累見于盟會,則知魯之政刑盡在諸臣矣。”²⁰

(二) 譜

程公說《分記》“譜”包含世譜七卷、名譜二卷,共有《王子王族諸氏世譜》《內魯公子公族諸氏世譜》《晉公子公族諸氏世譜》《齊公子公族諸氏世譜》《宋公子公族諸氏世譜》《衛公子公族諸氏世譜》《蔡公子公族世譜》《陳公族公子諸氏世譜》《鄭公子公族諸氏世譜》《曹公子世譜》《楚公子公族諸氏世譜》《吳公子世譜》《世譜叙篇考異》《列國君臣名譜》《外夫人妾名譜》《古人物名譜》。

雖然程公說《分記》的世譜、名譜不屬於《史記》體例,但“譜”的起源甚早,周代以前有帝系譜牒,司馬遷《史記》說到他參考《五帝繫牒》完成《三代世表》,改“譜”為“表”。²¹宋代《春秋》學除了程公說《分記》以外,沈括《春秋左氏紀傳》似乎也有世譜或其他類名,²²他的《春秋機括》同樣是譜牒類型的專著。²³鄧名世亦作《春秋公子譜》《列國諸臣圖》等圖譜,而《春秋四譜》同屬譜系之作,不只有一般的國別、年祚,還有地名、人名,²⁴這類世譜名譜的編纂正與

19 例如胡安國《春秋傳》曰:“僖公即位日久,季氏世卿,公子遂專權,政在大夫。”見胡安國撰,錢偉彊點校:《春秋胡氏傳》(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卷13,頁199。

20 高閔:《春秋集注》,卷17,《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冊151,頁394。

21 司馬遷:《三代世表序》,《史記》(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冊2,卷13,頁488。

22 李燾評沈括《春秋左氏紀傳》:“獨所序世族譜系,既與《釋例》不同,又非史遷所記,質諸《世本》亦不合也,疑撰者別據他書,今姑仍其舊,以俟考求。”見朱彝尊撰,林慶彰等主編:《經義考新校》,卷183,頁3361。

23 晁公武《郡齋讀書志》曰:“《春秋》譜也。”見晁公武撰,孫猛校證:《郡齋讀書志校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卷3,頁123。王應麟《玉海》詳載:“元豐中,沈括撰《春秋機括》三卷。上卷以魯公甲子紀周及十二國年譜,中卷載周及十二國譜系世次,下卷記列國公子諸臣名氏,其無異名者不錄。”見王應麟輯:《玉海》(揚州:廣陵書社,2003年),卷40,頁759。不過是書已佚,無法與《分記》比較譜系世次的異同,知其得失。

24 王應麟《玉海》記載:“名世以經、傳、《國語》參合援據,為《國譜》《年譜》《地譜》《人譜》。”參見王應麟輯:《玉海》,卷40,頁761。

宋代私家修譜的復興有關。²⁵ 至於程公說《分記》將“譜”列於紀傳體，也曾作《程氏大宗譜》十二卷，²⁶編纂形式應有受到歐陽修的啓發。

歐陽修(1007—1072)奉朝廷命編修《新唐書》，其中《宰相世系表》以唐代出任的宰相爲主，羅列各姓世系，以十二世爲斷限，依序標注人名、謚號或官爵。《宗室世系表》則是先按照李唐宗室分房，再表列世系，同樣以十二世爲起訖。歐陽修首創“引譜入史”的方法，這在宋代以前的史書是不曾有過的，²⁷所以程公說《分記》紀傳體設置“世譜”、“名譜”已有歐陽修嘗試在前，此其一。

第二，文天祥(1236—1283)言：“族譜昉於歐陽修，繼之者不一而足”，²⁸歐陽修創編《歐陽氏譜圖》，梳理了歐陽氏的源流，開啓譜學之風，影響後代編修，使譜法有所依循。他在《歐陽氏譜圖序》說明製譜的構想、原則、形式與功能，主要的創建是“九世圖式”的譜法：“斷自可見之世，即爲高祖，下至五世玄孫，而別自爲世。”²⁹玄孫除了上承其祖，下又自系子孫，讀者“推而上下之則知源流之所自，旁行而列之則見子孫之多少”。³⁰ 歐陽修將世譜設“表”的形式也落實在程公說《分記》一書。例如《齊公子公族諸氏世譜》編列九世、《內魯公子公族諸氏世譜》列以十二世，《晉公子公族諸氏世譜》《宋公子公族諸氏世譜》則序列十四世，各篇世譜所序不等，使讀者“使推而上下之則知源流之所自，旁行而列之則見子孫之多少。經其世，緯其人，雖衆而不亂”，³¹井然銓次，厥有條理。

25 錢大昕(1728—1804)說：“五季之亂，譜牒散失，至宋而私譜盛行。”見錢大昕著，陳文和、孫顯軍校點：《郡望》，《十駕齋養新錄》(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卷12，頁246。譜學雖於唐末五代開始散落，但至宋代卻又重新復興。學界已從時代背景、經濟條件和學術環境等因素，考察宋代譜學復興之因，如王鶴鳴羅列了幾項因素：宋代官方政府的支持倡導、社會經濟的發展與都市繁榮、圖書印刷事業空前發達，以及家族興辦塾學義學等都是促進族譜興起的原因。見王鶴鳴：《中國家譜通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頁107—112。此外，根據多賀秋五郎的統計，以族譜序跋來說，北宋有九篇，南宋則有四十三篇，南宋私譜更爲盛行，這股風氣似乎推動程公說《分記》十二篇世譜、三篇名譜的出現。見氏著：《中國宗譜的研究》(東京：日本學術振興會，1981年)，頁79。

26 劉光祖：《程伯剛墓誌銘》，程公說：《春秋分記》，《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54，頁7。

27 倉修良：《譜牒學通論》(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7年)，頁175。

28 文天祥：《跋李氏譜》，《文文山全集》(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5年)，卷10，頁250。

29 歐陽修著，李逸安點校：《歐陽修全集》(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卷74，頁1076。

30 同上，頁1079。

31 程公說：《春秋分記》，《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54，頁127。

不過,由於春秋時期諸侯衆多,《左傳》性質也不是專門記載春秋世族的源流續衍,因此程公說《分記》即使參考杜預、《世系》、《史記》編纂,但某些內容仍有訛舛,尤其以公族的序列錯誤最多。例如《宋公子公族諸氏世譜》華氏一族:

欽定四庫全書									
程氏春秋分記									
卷十二									
宋公子公族諸氏世譜									
華氏									
好父說									
華晉									
子世凌									
子御事									
子耦									
子元									
子閱									
子椒									
子弱									
寅									
孫定									
子啓									
子喜									
子吳									
子臣									
子臯比									
子無感									
子姓									
子軀									
子多像									
子登									
費遂									
亥									
合比									
搜									
華豹									
華免									

圖三 程公說《春秋分記》《宋公子公族諸氏世譜》³²

表中尚待商榷之處有二:第一,部分大夫世系未詳,但程氏卻已清楚載錄。例如“華椒”,顧棟高《春秋列國卿大夫世系表》已曰:“華氏如椒、合比、費遂,注疏不詳其所出。”³³陳厚耀(1648—1722)《春秋世族譜》亦將“華椒”置于空格之下,³⁴以示上無所承,唯程公說將“華椒”置于“華閱”之後,不知所據為何?第二,某些人物之關係文獻有所記載,而程氏所記不同卻未說明原因。

³² 程公說:《春秋分記》,《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54,頁108。

³³ 顧棟高輯,吳樹平、李解民點校:《春秋大事表》(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卷12,頁1308。

³⁴ 陳厚耀:《春秋世族譜》,《叢書集成續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年),冊246,頁46。

比方《左傳》昭公二十一年載：“宋華費遂生華貍、華多僚、華登。”³⁵此表“華貍”則為“華合比”之子。又如杜預認為“華弱”是“華椒”孫，³⁶陳厚耀、顧棟高亦作此編列，但程公說反而將“華弱”視為“華椒”之子，其他世譜的公族中都有類似的錯誤，讀者利用這些資料時得再斟酌。

當然可能因經傳資料有限，或是記載分歧疏略，因此難以詳考所有諸臣世次，不免產生掛一漏萬之失，但此瑕疵無法掩蓋《分記》世譜的學術貢獻。況且這編纂形式仍具備本支聯屬、連宗合族的功用，程公說也藉此凸顯公子公族強盛削弱的發展形勢。例如《內魯公子公族諸氏世譜》譜前小序：“世為卿大夫，凡舉氏者，皆專命之氏，其極至於有其民出其君而莫之禁。職此其故，余於是作《魯公族譜》而別氏者，又為《公族譜》以盡譜之變。合則族，別則氏。考其世，觀之成敗得失可睹矣。”³⁷《內魯公子公族諸氏世譜》的公子四世有仲孫慶父、叔公子牙、成季友，程公說標明三者：後為孟孫氏、叔孫氏、季孫氏。若檢閱公族可看到此三族的子孫人數廣嗣，遠較魯國其他氏族強盛，³⁸循此亦可理解昭公乾侯之禍有其開端和徵兆。

(三) 書

司馬遷《史記》設置八書之後，歷來對八書是否為太史公首創有不同持論，但有關八書的界定卻相當一致。司馬貞視之為“國家大體”，³⁹馬端臨以其為“典章經制”，⁴⁰近現代學者也都定義為分門別類的制度沿革。⁴¹《史記》八書之名為《禮書》《樂書》《律書》《曆書》《天官書》《封禪書》《河渠書》《平準書》，而

35 杜預注，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正義》，《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82年），卷50，頁868。

36 同上，卷30，頁516。

37 程公說：《春秋分記》，《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54，頁90。

38 同上，頁91—92。

39 司馬遷：《史記》，冊4，卷23，頁1157。

40 馬端臨著，上海師範大學古籍研究所、華東師範大學古籍研究所點校：《自序》，《文獻通考》，頁1。

41 柴德賡說：“這是一種系統記述典章制度的體裁，也可以說是分類史。”見柴德賡：《史籍舉要》（北京：北京出版社，2001年），頁7。

程公說《春秋分記》計有《曆書》《天文書》《五行書》《疆理書》《禮樂書》《征伐書》《職官書》等七篇二十六卷，主題編排和《史記》有些微不同，但在歷代史體的發展上，八書內容自司馬遷《史記》以降即不斷地重構與擴展，⁴²因此《春秋分記》也是演變中的一環，配合《春秋》經傳以序列主題。

關於《分記》七書中，亟須注意的是《疆理書》，因為篇幅最鉅，多達十一卷，⁴³包含邦域、山川、河渠三類，邦域又分爲王畿、魯、晉、齊、宋、衛、蔡、陳、鄭、曹、燕、秦、楚、吳、次國、小國等。邦域各區地理釋名大量參考杜預《釋例》，適時補充或指正箇中錯誤，而山川與河渠二類除了援引《釋例》之語，還參考《尚書·禹貢》、史書《地理志》與《水經注》等。主要特色有三：

第一，《疆理書》附有指掌輿圖。以《春秋》經傳研究者來說，南宋之前雖有謝莊《春秋圖》、楊湜《春秋地譜》都與地理相關，但皆已佚，如楊守敬提到：“《隋書·經籍志》梁有《春秋古今盟會地圖》一卷，亡。《新舊唐·志》及宋人著錄所載《春秋圖》無慮十餘家，而皆不傳。”⁴⁴因此程公說《疆理書》各篇附列指掌之圖就具備學術價值。而且歷來研究者討論杜預地理考證多直接跨到對清儒的啓發，鮮少關注程公說地理釋名也受到杜預影響，所以《分記·疆理書》可填補歷來研究《春秋》地理僅注意杜預至清儒縱向聯繫間的斷層。

第二，近人考證地理的方法、材料或文獻遠較古代便利，部分《左傳》地名學界也已有清楚論述，許多觀察角度則先見於程公說《疆理書》。例如楚國“豫章”一地，顧棟高已言此地諸說紛然，但斷言豫章並非江西南昌。⁴⁵今人程發軔

42 徐日輝從橫向的門類序列和縱向的門類擴展分析八書變化：“自《史記》而下，對八書的重構與擴展大體上集中在新構建的序列組合與新增加的門類發展兩大方面。具體而言，從《漢書》十志起，史官們將八書的內容和名目，依據當時政治形勢和社會需要的限制，予以重新構建變化爲新的序列組合；在重新組合的同時，又不斷地將八書未曾涉及的內容廣爲擴展，成爲一部部各領風騷的新書志。”見徐日輝：《史記八書與中國文化研究》（西安：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頁57。

43 各書卷數如下：《曆書》四卷、《天文書》一卷、《五行書》一卷、《疆理書》十一卷、《禮樂書》三卷、《征伐書》二卷、《職官書》四卷。此節先聚焦《疆理書》，其他內容則置於後文討論。見程公說：《春秋分記》，《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54，卷19—44，頁164—490。

44 楊守敬：《春秋列國圖自序》，周康燮主編，存萃學社編集：《楊守敬研究彙編》（香港：崇文書店，1974年），頁8。

45 顧棟高輯，吳樹平、李解民點校：《春秋大事表》，卷7，頁853—855。

《春秋左氏傳地名圖考》更具體辨析《左傳》六見“豫章”，除了昭公二十四年所記乃位於江西餘干的鄱陽湖濱，其他五處皆位於安徽壽縣。⁴⁶ 上溯程公說《疆理書》，其先援引杜預語，另補充曰：“春秋豫章蓋在江北，而今豫章隆興府非春秋之豫章也。《漢·地理志》豫章郡：高帝置第，年代闊遠，文字殘闕，無從考見所徙年月耳。按宋武帝討劉毅，遣王鎮惡先襲至豫章口。豫章口去江陵城二十里，信知春秋豫章去江陵甚近，今隆興蓋不相干。”⁴⁷ 南宋隆興府本於洪州（今江西省南昌市），⁴⁸程公說認為春秋豫章應屬江北與淮南間（今安徽省），並非位屬江南隆興府，與江西南昌無關，觀點能呼應顧棟高、程發軔。⁴⁹

第三，《疆理書》不只考證疆域、辨析地名，每篇總說還將地理形勢結合政治歷史，並非單純考辨地名沿革而已。例如總說齊地封域：“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阻渤海之險，憑河濟之固，後據千乘，前倚兗濮。擅利魚鹽，形勢十二。故太公用之而富，桓公資之以霸，自桓公後雖不復霸矣，然憑藉地利，猶得以雄彊於諸侯。”⁵⁰ 齊國地理有良好的自然經濟，具備先天優勢，因此在春秋列強中佔有一席之地，觀察視角如同評論宋國地勢平坦，四通八達，沒有名山大川或鴻溝巨壑作為險阻，導致宋襄公無法與諸侯匹敵抗衡，⁵¹ 符合“因以求并吞侵削之迹，而考彊弱得失之鑑”的著述動機。⁵² 此外也從不同的地理條件注意到相異的人文民風，比方以曹國封域在雷夏荷澤之野，堯、

46 程發軔：《春秋左氏傳地名圖考》（臺北：廣文書局，1969年），頁91。

47 程公說：《春秋分記》，《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54，頁321。

48 脫脫等撰：《地理志》，《宋史》（臺北：洪氏出版社，1975年），卷88，頁2189。

49 又如《左傳》哀公二十六年：“公游于空澤，辛巳，卒于連中。大尹興空澤之士千甲，奉公自空桐入如沃宮。”見杜預：《春秋釋例》（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70年），卷5，頁15。文中有“空澤”“空桐”二地，杜預謂“空澤”為宋邑，而“空桐”是“梁國虞縣東南，有地名空桐，有桐亭”，看似分屬二地，但程公說引《水經注》“空桐澤在虞城東南”，判斷“空澤”與“空桐”當為一也。見程公說：《春秋分記》，《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54，頁293。對照程發軔《春秋左氏傳地名圖考》引《嘉慶重修一統志》《郡國志》《太平寰宇記》之文獻，“空澤”即是“空桐澤”，位於河南虞城五里縣南，上有“空桐亭”。見程發軔：《春秋左氏傳地名圖考》，頁270。由此可知，程公說判斷無誤。

50 程公說：《春秋分記》，《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54，頁283。

51 同上，頁290。

52 同上，頁258。

舜曾活動於此，故“民俗化其遺風，重厚多君子。務稼穡，薄衣食，以致蓄積”；⁵³以秦地“土曠而腴、民義而健”；⁵⁴以荆楚“陽盛物堅、其俗急悍”，⁵⁵呈現各地區政教風俗，有歷史人文地理的研究色彩。

另外，柳詒徵《國史要義》提出“史聯”觀點：“史之所紀，則若干時間，若干地域，若干人物，皆有聯帶關係，非具有區分聯貫之妙用，不足以臚舉全國之多方面，而又各顯其特質。……史之為義，人必有聯，事必有聯，空間有聯，時間有聯。紀傳表志之體之善，在於人事時空在在可以表著其聯絡。”⁵⁶所謂“聯散者，紀傳體所獨擅”，⁵⁷柳詒徵分析紀傳體能將不同的特質分著於所屬篇體，帶有賓主、輕重、本末、繁簡之別，複筆略筆之間相得益彰。按照《分記》對表、譜、書、世本的體例設置，我們可發現這四類分法就有柳詒徵所提出的特色。如《職官書》中記載魯三卿、晉六卿、宋右師、鄭世卿等官，但因為已有《魯卿年表》《晉卿年表》《宋卿年表》《鄭卿年表》，故所記較略，各有側重。抑或《禮樂書》和《鄭世本》皆討論到鄭國禮制，但前者主要扣緊子產個人如何以禮相鄭，後者則將子產以禮自固一事，提高到鄭國如何自處於晉、楚爭強，兩篇駢列之事明顯有不同的廣狹深淺。換言之，《分記》七書雖以典章制度為主，但可結合表、譜、世本參看，方能將錯綜離合之人事襯托互著。

(四) 世本

司馬遷《太史公自序》提到撰寫世家的用意：“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輻共一轂，運行無窮，輔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⁵⁸天子在國家政治有其中心地位，眾臣輔弼股肱如同拱辰共轂、百川歸海，君臣由上至下，由內而外地屏藩社稷，典守邦土，形成一休戚共榮的治體倫理。程公說《分記》不言“世家”而稱“世本”，取自最早的譜牒著作《世本》之名。據司馬貞

53 程公說：《春秋分記》，《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54，頁 309。

54 同上，頁 312。

55 同上，頁 314。

56 柳詒徵：《國史要義》（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 年），頁 102、113。

57 同上，頁 269。

58 司馬遷：《太史公自序》，《史記》，冊 10，頁 13319。

《索隱》引劉向語：“《世本》，古史官明於古事者之所記也。錄黃帝已來帝王諸侯及卿大夫系謚名號，凡十五篇也。”⁵⁹《世本》載錄五帝三王、三十三國諸侯、四十五家卿大夫的譜系、姓氏、謚名，梳理上古世代承傳之源流。《春秋分記》承其名義，先序世周室，後列“諸侯本系”之事，⁶⁰呈現藩侯世代升降的狀況。

《分記》全書總計九十卷，“世本”就佔了後四十六卷，篇幅最多，包括《周天王》《內魯》《晉世本》《齊世本》《宋世本》《衛世本》《蔡世本》《陳世本》《鄭世本》《曹世本》《燕世本》《秦世本》《楚世本》《吳世本》《次國》《小國》《四夷附錄》。每篇體例先說明諸侯國於春秋之前的源流，再以各國諸侯嗣世為序，逐次收錄與《春秋》《左傳》相關的經傳內容。如《齊世本》開篇即交代國姓、封地、尊祖，續按僖公、襄公、桓公、孝公、昭公、懿公、惠公、頃公、靈公、莊公、景公、安孺子、悼公、簡公、平公等，羅列經傳材料；若無傳文則會在經文底下另外標注“無傳”，而且有可能同一傳文述及的國家衆多，所以也另標明附於何處，比方齊襄公：

桓公經十有五年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無傳 五月公會齊侯于艾。傳見許
 經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
 傳十七年春盟于黃平齊紀。夏及齊師戰于奚疆事也。爭疆界
 經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夏四月丙
 子公薨于齊。丁酉公之喪至自齊。傳見內魯
 莊公經元年春王正月夫人孫于齊。夏單伯逆王姬。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冬王姬歸于齊。齊師遷紀邢鄆鄆。經二年秋七月齊王姬卒。無傳 冬
 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
 經三年秋紀季以鄆入于齊。為附庸傳見紀 經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
 齊侯于祝丘。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無傳 冬公及齊人狩于禚。
 經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無傳 ⁶¹

59 司馬遷：《太史公自序》，《史記》，冊 10，頁 2。

60 同上，冊 5，頁 1445。

61 程公說：《春秋分記》，《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54，頁 710—711。

視其主客輕重，編置於適合的篇目底下，省去全部附列於各個世本，衍生冗贅查雜的缺失。部分諸侯會有得失評述，以齊襄公來說，程公說就批評他“絕滅天常，縱肆人欲”“蕭牆之不謹而動干戈於外”“內淫而外暴，將及于亡而不自知甚矣”。⁶² 不過最重要的在於每篇文後皆附“論曰”，統括諸侯始終強弱的歷程，揭櫫興亡世變之由，以作為昭示鑑戒。必須提及，《左傳》雖然載錄許多國家，但畢竟以大國事跡為詳，小國所記相對疏略，程公說編輯“世本”特別注意始終先後，適時參考其他典籍補備闕遺，如《燕世本》就明言：“余因摭《世本》《外紀》《古史》等文參校異同，緝其始終春秋傳國之序以補燕闕文云。”⁶³

也由於“世本”大量載記《左傳》資料，所以出現不少程公說點出《左傳》錯誤之處，或是援引前人如趙匡、劉敞糾舉《左傳》的觀點，這在“表”“譜”“書”中較為少見。如同《宋世本》中，詳列《左傳》宣公十五年，宋國糧盡援絕，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床，與其盟誓，欲其退兵。程公說依據《史記》《宋世本》，認為是子反將宋國“析骨易子”一事轉告楚莊王，所以楚莊王決定罷兵，非如《左傳》所言華元、子反二人私盟，並評斷：“其事大同小異，以理推之，則馬遷為得，而左氏幾近於誣！”⁶⁴ 反對《左傳》此處記事。又如《內魯》收錄《左傳》襄公五年肯定季文子之語：“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程公說就直接批評：

魯公室失政自宣公始，季氏專魯自文子始，《春秋》傷焉。如曰“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言自宣失政，至成、襄、昭、定而魯訖不振，左氏乃以為“季文子相三君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三君者指宣、成、襄也。魯國之政，季氏專之；魯國之民，季氏有之，而曾謂其家無私積哉！蓋左氏之嗜誣斯人也已，吾無取乎爾也。⁶⁵

62 程公說：《春秋分記》，《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54，頁 777—712。

63 同上，頁 895。

64 同上，頁 761—762。

65 同上，頁 558。

文末“蓋左氏之嗜誣斯人也已，吾無取乎爾也”是取自柳宗元《非國語》一語，同樣直斥左氏妄言虛語。而“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乃《論語》《季氏》記載孔子評論天下失道，大夫僭越諸侯的狀況。程公說援引其言，印證季孫行父專權亂階、驕悖無君，否定《左傳》以季孫行父忠於魯君的評價。

三、程公說《春秋分記》的解經義法

《春秋》經的原型是魯史《春秋》，既為後代史書之濫觴，還發展成經學注疏的體系。《分記》雖是體現《春秋》史學的性質，但“《春秋》所重者，固在其義”，⁶⁶以“新史體”作為詮釋的論著仍脫離不了麟經大義的詮釋系統，吾人必須關注程公說如何用不同的經解體式衍釋增益、尋繹發明。

(一) 以胡安國《春秋傳》經說為旨歸

《分記》《叙傳授》提到《分記》之作：“論述大綱本孟子，而微詞多取程氏胡氏之論”，⁶⁷這已向讀者明示其學術取向。自《孟子》《離婁下》引孔子語，述及《春秋》有其義，歷來儒者無不聚焦於麟經大義，程公說《分記》也依循這條脈絡。不過《分記》並非以建構大義的內容為主，而是延續著程頤、胡安國所抉發的經義，從《述綱領》首列胡安國之說，並附上胡安國《春秋傳序》，可見胡安國對程公說的影響，若再按《分記》所載，更能顯現其書以胡安國經說為旨歸。

比方胡安國《春秋傳》的攘夷色彩極其鮮明，《分記》會依循胡《傳》說法闡發攘夷大義。如《分記·蔡世本》從蔡國面對楚國威脅，延伸至攘夷之道：“終春秋世從楚而受楚禍，聖人蓋傷之也。天下莫大於理，莫強於仁義，循天理、崇信義以自守其國家，荆楚雖大，何畏焉？……觀諸侯會盟離合之迹，而夷夏盛衰之由可考矣；觀《春秋》進退予奪抑揚之旨，而知安中夏討四夷之道矣。”⁶⁸這是參照胡安國安內即可攘外之說：“天下莫大於理，莫強於信義，循天理，惇信義，

66 陳澧：《東塾讀書記》（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7年），卷10，頁161。

67 程公說：《春秋分記》，《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54，頁13。

68 同上，頁819。

以自守其國家，荆楚雖大，何懼焉？”⁶⁹ 確立夫婦、父子、君臣等社會秩序，自然可應對邊境夷狄的滋擾，遏人欲、正大倫、存天理為有國之急務。

其他像胡《傳》謂魯隱公即位不正，“內不承國於先君，上不稟命於天子，諸大夫扳己以立而遂立焉，是與爭亂造端，而篡弑所由起也。《春秋》首絀隱公，以明大法，父子君臣之倫正矣”，⁷⁰ 程公說《分記》節錄胡氏說法，於世本《內魯》循此發義：“蓋自隱公乖於大義，亂天下繼立之分，啓桓公篡奪之禍，自桓公篡奪而三桓之兆成。……然則《春秋》自元年，首絀隱公即位以明王法，足以貫二百四十二年行事，謂非聖人莫能修之，渠不信夫！”⁷¹ 同樣直指周平王末年正值隱公一世，魯隱公是魯國爭亂篡弑之肇端，因此隱公元年不書即位，《春秋》絀隱，以明王法。

又如《春秋》哀公八年：“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我們可將胡安國與程公說的詮解並列如下：

胡安國《春秋傳》	程公說《春秋分記》
<p>此滅曹也，曷為不言“滅”？滅者，亡國之善詞，上下之同力也。曹伯陽好田弋，鄙人公孫彊獲白鴈獻之，且言田弋之說，因訪政事，大說之。彊言霸說於曹伯，因背晉而奸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書“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而削其見滅之實，猶虞之亡書“晉人執虞公”，而不言滅也。《春秋》輕重之權衡，故書法若此。有國者，妄聽辯言以亂舊政，自取滅亡之禍，可以鑑矣。⁷²</p>	<p>論曰：《春秋》志用兵，輕重淺深各有不同，而其甚莫極於滅。滅者，亡國之重辭，曰上下同力也。宋景公入曹，以曹伯陽歸。《春秋》止書入而《左氏》傳其事，謂曹伯陽好田弋，曹之鄙人公孫彊因進田弋之說，陽好之，彊因言霸說陽，乃背晉而奸宋，宋伐之，晉不救而遂滅。且曹實滅矣，而書入者，言其自滅也，故削其見滅之迹，猶虞之亡書“晉人執虞公”而不言滅也，是罪在曹伯陽，而惡不在宋也。《春秋》筆削之法，輕重抑揚，厥有深旨。後之有國有家者，聽辯言以亂舊政，好游田以廢民事，將自取滅亡而不之悟。觀《春秋》書曹伯陽之事，可以鑑矣。⁷³</p>

兩人同舉《左傳》記載曹伯陽喜田弋，寵任好弋者公孫彊，並聽信其稱霸策略，背晉奸宋，導致宋人伐曹、滅曹。《春秋》書“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不書

69 胡安國撰，錢偉彊點校：《春秋胡氏傳》，卷4，頁48。

70 同上，卷1，頁3。

71 程公說：《春秋分記》，《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54，頁607。

72 胡安國撰，錢偉彊點校：《春秋胡氏傳》，卷30，頁493。

73 程公說：《春秋分記》，《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54，頁891。

“滅”意味自取滅亡，未符合《公羊》書“滅”乃國家上下同力，亡國重辭之義，曹伯陽才是國家見滅的主因，而後代治國者亦可從曹伯陽之行事汲取歷史經驗，以資世教，程公說明顯參考胡《傳》發義，亦如沈玉成、劉寧《春秋左傳學史稿》的觀察：“全書大旨，則仍以胡安國之說為指導思想。”⁷⁴

(二) “史體”縮合“經義”

宋鼎宗《春秋宋學發微》約舉《分記》之要旨為尊王攘夷：“《分紀》一書，雖以考核舊文，杜虛辨之口舌為有功，然亦時時以尊王攘夷為大義也明矣。”⁷⁵南宋初渡，胡安國《春秋傳》亦基於《公》《穀》隱諱之辭大張“尊王室”、“正王法”的精神。相對於“紀傳體”的《分記》而言，胡安國《春秋傳》屬於“解義體”，⁷⁶直從聖人書法建構尊王義旨，也就是將經文的遣詞造句、筆削去取、記事詳略等作為中介，推演麟經的尊王之道，因此經文書“天王”“王”，或是盟會序列等形式皆有寓義。但《分記》並非解義體，全書又多由表譜構成，因此程公說該如何發明“尊王”之體用就顯得相當重要。

《分記》首篇是《周天王內魯外諸侯年表》，表前小序說明製表體例：

余今表周、魯以及外諸侯，旁行斜上，年經國緯，以統其時。尊周天王而內魯次之，齊、晉主盟中夏，其事莫詳焉，故得列於魯之後。而齊之後於晉，則以晉於周、魯為親，且其霸視齊為長也。凡諸侯同德尚爵，同爵尚親，自齊而下，宋、衛、蔡、陳，地醜德齊，莫能相尚，而宋以公爵列于三國之首。衛、蔡、陳，爵皆侯也，鄭、曹、燕、秦，皆伯也，而陳、秦獨後焉，則異姓為後之義也。若楚、吳、越皆以僭號抑于《春秋》，則附下方，由是言之而年表之作可得而觀矣。⁷⁷

74 沈玉成、劉寧：《春秋左傳學史稿》，頁 243。

75 宋鼎宗：《春秋宋學發微》（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6 年），頁 90—91。

76 吳國武認為這種體式的特點是：“側重在據經以分析義理。在形式上和注釋相似，一般都會先載原文，然後作解義，只是不重前人注疏。”見吳國武：《經術與性理：北宋儒學轉型考論》（北京：學苑出版社，2009 年 3 月），頁 121。

77 程公說：《春秋分記》，《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54，頁 13。

體裁形式上冠周爲經，列國爲緯，效法孔子以周正紀《春秋》，採“以一統萬、以同會異”之法，⁷⁸再依序排列魯、晉、齊、宋、衛、蔡、陳、鄭、曹、燕、秦、楚、吳、越等諸侯國，揭櫫《春秋》“尊王”經旨。

歷代以《春秋》經傳爲主題的年表或紀國類著作，並非皆冠周於前。據《皇宋中興兩朝聖政》記載：“紹興四年六月，秘書丞環中知臨江軍中，嘗進《春秋年表》，沈與求奏不當先魯而後周，上曰：‘士大夫著述，譌舛容有之，中爲人臣，乃不知尊王之義，豈可置之三館？’”⁷⁹南宋環中作《左氏二十國年表》就選擇先魯後周的排列，被當朝斥爲不知尊王。又如元代齊履謙(1279—1321)作《春秋諸國統紀》，《目錄》曰：“今之《春秋》一經，聖人以同會異，以一統萬之書也。始魯終吳，合十二國史記而爲之也。”⁸⁰對孔子作《春秋》採“以同會異，以一統萬”的方法與程公說相同，但紀國卻是先魯後周，次及宋、齊、晉、衛、蔡等諸侯。可見《周天王內魯外諸侯年表》冠周寓有強烈的尊王精神，如同他將周王序於世本之首：“《春秋》所書皆傷周之微，而尊王以見志也。《左氏》傳經，間紀其事。今余分系列國，推明尊王，著周爲冠。”⁸¹同樣具備維繫周統的用意。

“尊王”或“攘夷”經旨又可體現在《分記·世譜》。程公說《世譜叙篇考異上》說明編纂世譜的原因有三：第一，杜預《世族譜》世次闕如、重複牴牾。第二，《左傳》稱號紛亂，漫無所據。第三，近世纂圖，前後錯出，尚多疎誤。因此有意重新補正，取材以《春秋》經傳爲本，再參取杜預、《世系》、《史記》等書。⁸²杜預《世族譜》是目前最早可看到與《春秋》人物有關的譜表，排序以魯爲首，次爲周室，接續乃邾、鄭、宋、紀、衛、虢、莒、齊、陳、杞、蔡、郕、晉、薛、許等諸國，大抵以見於《春秋》經傳之先後爲序。⁸³但程公說《分記》“世譜”則首列王子王族

78 程公說：《春秋分記》，《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54，頁 13。

79 朱彝尊撰，林慶彰等主編：《經義考新校》，卷 186，頁 3406。

80 齊履謙：《春秋諸國統紀目錄》，《春秋諸國統紀》，《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冊 159，頁 868。

81 程公說：《春秋分記》，《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54，頁 491。

82 同上，頁 127。

83 程發軔：《春秋人譜》（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0 年），頁 1。

表示“尊王”之義，次置魯、晉、齊、宋、衛、蔡、陳、鄭、曹、楚、吳，先夏後夷以明“華夷之辨”。“名譜”有《列國君臣名譜》一篇，附杞、滕、薛、莒、邾、小邾、越人、許、虞、虢、畢、祭、州、隨、邢、唐、息等八十個小國，前有大國世譜，後有小國名譜，亦印合《春秋》“詳內略外”之法。⁸⁴ 而“夫婦之道，教之本也”，⁸⁵“譜”的末尾安排《外夫人妾名譜》，用意如同《周天王內魯外諸侯年表》之後設立《王后年表》《內夫人年表》《內妾母年表》《王姬年表》《內女年表》，慎“男女之配”，如胡安國所言：“凡男女之際，詳書于策，所以正人倫之本也，其旨微矣。”⁸⁶ 由此可見，程公說《分記》經解旨歸雖主從胡安國，但卻另由“史體”的體例縮合“經義”，成為其書的學術特色。

（三）褒貶之法：高度依附《左傳》記事

清代四庫館臣提到：“蓋不信三《傳》之說，創于啖助、趙匡，其後析為三派：孫復《尊王發微》以下，棄《傳》而不駁《傳》者也；劉敞《春秋權衡》以下，駁三《傳》之義例者也；葉夢得《春秋讖》以下，駁三《傳》之典故者也。”⁸⁷ 宋儒研治《春秋》逐漸形成棄《傳》、駁《傳》的學風，像南宋趙鵬飛《春秋經筌》就強烈批評《左傳》，謂其“辭費義寡”、“以傳聞之說附會以解經”，指責左丘明“淺陋不學”、“採野人之語而亂《春秋》者多矣”，⁸⁸ 反對學者治經依循《左傳》，而程公說的成書動機正與學者捨傳從經的研究路線有關。

《分記·自序》曰：“學者高則束傳而談經，下則徇文而違理，常竊病之，輒推《春秋》旨義，即《左氏傳》分而記焉。”⁸⁹ 礙於時空距離，掌握經典內涵本身就有一定的難度，但當代不良的學風卻加速人們疏遠經典，開放的學術思潮反而封閉了聖人的思想，因此程公說有意端正學風，選擇高度依附經傳文本。

84 程公說：《春秋分記》，《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54，頁 156。

85 同上，頁 51。

86 胡安國撰，錢偉彊點校：《春秋胡氏傳》，卷 18，頁 290。

87 紀昀、陸錫熊、孫士毅等：《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卷 28，頁 357。

88 趙鵬飛：《春秋經筌》，《通志堂經解》（臺北：漢京文化事業公司，1985 年），冊 20，卷 7，頁 11687；卷 8，頁 11739；卷 8，頁 11740；卷 12，頁 11850。

89 程公說：《自序》，《春秋分記》，《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54，頁 4。

例如《春秋》記載滕國諸侯唯桓公二年“滕子來朝”、僖公十九年“宋人執滕子嬰齊”較受爭議，因為隱公經文滕宣公來朝仍書“滕侯”，至桓公來朝卻書“滕子”，之後到魯哀公經文亦皆以“滕子”書。主張捨傳從經如趙鵬飛採取“原情”，推測行事者的內在動機，⁹⁰強調滕子爲了不被大國侵犯，遂自降爵號以求無患，故桓公二年滕子來朝降爵稱“子”。⁹¹ 至於僖公十九年“宋人執滕子嬰齊”之經文，趙鵬飛將此與莊公十年“齊師滅譚，譚子奔莒”相較，謂聖人贊同齊桓滅譚而示威於楚，譚子不名乃譚子無罪見滅；宋襄執小國之君以肆其虐，聖人罪其非霸，滕子書名是滕子雖有罪亦不應見執。⁹²

而程公說《分記》則在“世本”編列了《次國》，當中收錄滕宣公、滕昭公、滕文公、滕成公、滕悼公、滕頃公、滕隱公，總共二十則經文、十則《左傳》傳文，循此本末始終定調“滕之降爵，固以見其日就卑替，然稽其始降，則昉乎宣公爲之也”，⁹³抨擊滕宣公來朝篡弑亂賊魯桓公，影響滕國於《春秋》中的定位；又結合《左傳》記載齊桓公舉行衣裳之會，滕宣公皆未參與，故僖公十九年“宋人執滕子嬰齊”乃“《春秋》書名以惡之”。⁹⁴ 程公說此處雖然採名爵褒貶，但不是由相同句法語式的經文找出正、變例以發明經旨，和傳統從規範化後的類例討論義法的路徑有別，也與趙鵬飛緣於個人揣摩臆解的角度不一。⁹⁵ 他選擇直從《左傳》見其行事，高度依附文本，大量排比《春秋》《左傳》相關事迹後取得結論，所以褒貶是集中在與當事人有關的數則經文，儼然變成一串褒貶群組，並非聚焦

90 康凱淋分析趙鵬飛採原情、達權的解經方法，原情是指行事者的動機、意圖、念頭，而達權則指外在的環境、現象或狀態，見康凱淋：《原情達權：趙鵬飛〈春秋經筌〉的解經方法》，《臺大文史哲學報》第95期(2021年5月)，頁1—37。

91 趙鵬飛：《春秋經筌》，《通志堂經解》，卷2，頁11581。

92 同上，卷7，頁11682—11683。

93 程公說：《春秋分記》，《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54，頁985。

94 同上。

95 家鉉翁就否定趙鵬飛詮解桓公二年“滕子來朝”之觀點：“木訥謂諸侯自貶損其爵以事大國，不欲與大國抗禮也，審如是，《春秋》何不爲之正名乎？此說尤不然！”更多次批評《春秋經筌》“駕空立說”“好揣摩傳會以爲之說”“好以揣摩議古”。見家鉉翁：《春秋集傳詳說》，《通志堂經解》(臺北：漢京文化事業公司，1985年)，冊24，卷3，頁13564；卷6，頁13605；卷7，頁13621；卷21，頁13792。

於單一經文的字詞而已，方法平實，不易流於主觀武斷之弊。⁹⁶

上述的滕宣公就已將《春秋》隱公十一年“滕侯、薛侯來朝”、桓公二年“滕子來朝”、僖公十九年“宋人執滕子嬰齊”結合為一體，其他像《宋世本》中，程公說同樣排比了與宋襄公有關的十七則經文、十五則傳文以評斷其行：

桓公既沒，襄公於是乎欲繼齊之伯，一盟曹南，諸侯寢寢從之，乃不能內自省德，急於合諸侯。執滕子嬰齊，非伯討不足以示威；盟曹而復圍之，非同志不足以示信，甚則與楚盟會，豈攘夷狄、尊王室之義乎？《春秋》人宋公於鹿上之盟、孟之會直書其事而不隱，于泓之敗詞繁不殺，所以深貶之也。⁹⁷

“不能內自省德”是宋襄公在位的行事評價，而《春秋》僖公二十一年“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孟”、二十二年“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三則經文，一書“宋人”，一直書其事，一詞繁不殺，雖各有不同的筆法，但卻連結為一套經文群組，共同貶斥宋襄公，帶出《春秋》攘夷狄、尊王室之大義。

因此，統合上述，程公說雖然依循胡《傳》的經解大義，但不步武胡《傳》“類例”的經解方法，而是高度依附《左傳》記事，總結出聖人褒貶的意向，符合戴維所言，它是調和程胡之說與蜀學重《左傳》的特色，⁹⁸彼此的“義”、“法”之間互有異同。至於依附《左傳》記事的價值就如同清代四庫館臣的評價：“獨能考核舊文，使本末源流，犁然具見，以杜虛辨之口舌，于《春秋》可謂有功矣”，⁹⁹跳脫當代異說蜂起、破碎大道的氛圍，為經典詮釋導向務實的發揮空間。

⁹⁶ 勞思光評價程公說《春秋分記》：“資料甚豐，議論亦罕有武斷之處，與一般宋人喜說己見者不同。應屬平實之作。”見勞思光：《儒學辭典詞條》，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勞思光先生存稿整編》，http://phil.arts.cuhk.edu.hk/project/LSK_mss/?p=1131，2022年3月21日訪問。

⁹⁷ 程公說：《春秋分記》，《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54，頁780。

⁹⁸ 戴維《春秋學史》說：“程公說本身屬蜀學派，極重《左氏》，但他又以程頤、胡安國為旨歸，故其書具有調和程胡之說與蜀學重《左氏》的特色。”見戴維：《春秋學史》，頁359。

⁹⁹ 紀昀、陸錫熊、孫士毅等：《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29，頁349。

四、程公說《春秋分記》的史鑑寄寓

“以史爲鑑”向來是中國傳統重要的政治思維，人們將歷史的理亂榮枯作爲治世資鑑的指導原則。《左傳》成公十四年君子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修之？”¹⁰⁰昭公三十一年亦有類似說法：“《春秋》之稱微而顯，婉而辨。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是以君子貴之。”¹⁰¹這《春秋》五例可分爲載筆之體、用，¹⁰²其中載筆之用“懲惡勸善”更成爲後代修史資鑑精神之濫觴。¹⁰³司馬遷《史記》“考其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乃徵諸歷史，¹⁰⁴總結古今盛衰的規律，以施國政。司馬光(1019—1086)也承自《左傳》《史記》，將前行的善惡得失作爲價值判斷：“臣今所述，止欲叙國家之興衰，著生民之休戚，使觀者自擇其善惡得失，以爲勸戒。”¹⁰⁵

程公說《分記》取材於《左傳》，體例仿於《史記》，自然也寓託史鑑思想。《周天王世本》曰：“夫事未有不成功於善而敗於惡，治未有不生於明而亂於昏，故雖一人而始終不同，況異世哉！系其世而別之跡，昭明廢昏，以探《春秋》聳善抑惡之意，蓋所以訓也。有天下國家者，其鑒於茲。”¹⁰⁶明白揭示《分記》與《春秋》“聳善抑惡”的相承關係。

100 杜預注，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正義》，《十三經注疏》，卷 27，頁 465。

101 同上，卷 53，頁 930。

102 錢鍾書：《管錐編》（北京：中華書局，1999 年），頁 162。

103 陽平南認爲以史資鑑的歷史意識雖由來已久，但《左傳》是開始明白揭示懲惡勸善之資鑑精神者，並舉出兩項論證：“一、《左傳》兩度明確表述懲勸資鑑之修史原則，以‘春秋五例’懸鵠，並創下有組織、有系統地結合以事傳經、以義傳經的先例；二、從《左傳》開始，明白地定位史官角色，史官自覺其負有資鑑之責，由此可印證：這種自覺就是身爲史官的左氏之自我期許。”見陽平南：《〈左傳〉叙戰的資鑑精神》（臺北：文津出版社，2001 年），頁 43—44。

104 班固撰，顏師古注：《司馬遷傳》，《新校本漢書集注》（臺北：鼎文書局，1997 年），卷 62，頁 2735。

105 司馬光編著，胡三省音注：《魏紀一》，《資治通鑑》（北京：中華書局，1956 年），卷 69，頁 2187。

106 程公說：《春秋分記》，《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54，頁 491。

以《分記》中的“書”來說，箇中載錄的典章制度最終仍落實到人事治革，無不具備史鑑思想的闡發基礎。例如《征伐書》述及“兵刑一道與寓兵於農之意同，藏用不示，習武不覲，要使民閑於教而無鬪狠，上藉其力，下安於義”，主以“禮義”興行，故兵刑可措置不用。逮周衰入於春秋，“先王經世遺制，日以廢壞”，轉向以“兵刑”為恃，“所謂寢兵措刑，寓兵於農之深意，掃滅無遺”，最終導向戰國七雄之爭、商鞅阡陌之變，因此作《征伐書》以為永鑑，揭櫫“德治”的重要。¹⁰⁷ 又如《禮樂書》，程公說曰：“周公相成王也，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服，其於謹於禮矣。禮之有天子諸侯之別，由古以來未之有改也。”¹⁰⁸ 高舉“禮治”的重要，而從其收錄的禮樂制度，屢見春秋王室諸侯“非禮”、“僭禮”，¹⁰⁹ 顯見周室既失典刑，王綱頹倒，故諸侯上僭悖禮。如魯國“以僭自怙”、“僭佚漸啓”，¹¹⁰ 程公說採取“於序事中寓論斷”之法，¹¹¹ 《禮樂書》附《論魯車服之失》《論魯饗禮之失》《論魯禮之變》《論魯僭樂之失》等文，呈現魯公無王之甚。其他像是鄭國“偏於晉楚，而禮樂之僭尚多有之”：將周厲王之王宮設於邦國“非禮”；鄭簡公賞賜子展先路、三命車服與八座城邑，賞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與六座城邑，車服乃出於周天子，鄭簡公卻自賜其臣，亦是“非禮”；鄭厲公設享禮招待周惠王，備齊六代之樂更是“僭也”。整個春秋時期，“王室弱，伯權盛，諸侯莫有事君以禮者矣”，¹¹² 讀者可從《禮樂書》釐清禮樂制度對春秋諸侯興亡盛衰的重要性，總結歷史經驗與教訓，以為鑑戒。

司馬遷製作八書時就已強調“承敝通變”的功用，¹¹³ “書”並非只詮次文獻、魚

107 程公說：《春秋分記》，《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54，頁 413—414。

108 同上，頁 387。

109 例如：“來求者三：春秋邦國貢賦不入，雖喪紀之具、車服之用、幣金之費不能自給，反求乎下，著非禮矣”、“歸贈賑三：車馬曰贈，珠玉曰含。賑膳之禮以親兄弟之國，禮也。平王贈妾母於前，襄王加賜妾母於後，敬王不待助祭而歸賑，非禮也”、“來錫命者三：桓公篡立，生而王不能討，死又加寵。文公居喪未終，成公未嘗入覲而錫之命，著非禮也”。同上，頁 389。

110 同上，頁 386、387。

111 顧炎武：《史記於序事中寓論斷》，顧炎武著，黃汝成集釋，樂保群、呂宗力校點：《日知錄集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卷 26，頁 1429。

112 程公說：《春秋分記》，《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54，頁 389。

113 司馬遷：《太史公自序》，《史記》，冊 10，卷 130，頁 3319。

貫典制,止於史料文獻的記事功能,而是透過沿革興變考察垂法式規之宗旨。程公說《分記》亦不例外,序文已言:“得失盛衰之變,亦備論其故”,¹¹⁴“書”除了追溯典制源流,又於序文將春秋政制之因革與古代聖王相比,參稽價值判斷,作為有國者立政之綱紀。所以如《職官書》序文先上溯黃帝、顓頊、堯、舜、禹如何命官分職,用於百事,沿至“周衰侯度不謹,官失常守而百職亂,迄于春秋,周公所作之法度亂其常矣,所建之官制廢其守矣”,¹¹⁵所列官制可見春秋變古亂常、負成周法度。

以魯國官制而言,《職官書》內魯“大宰”條目下引《左傳》隱公十一年:“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太宰。”孔穎達《正義》說明:“天子六卿,天官為大宰,諸侯則并六為三而兼職焉。昭四年《傳》稱季孫為司徒,叔孫為司馬,孟孫為司空,則魯之三卿無大宰。”¹¹⁶因此魯國不得設“太宰”之官,程公說謂公子翬求之為僭:“侯國冢宰之事,司徒兼之,其下當置小宰。大夫曰大宰,僭也。雖於時不果命翬,必魯嘗置此官而後翬求為之也。”¹¹⁷更質疑魯國曾置“太宰”,故公子翬遂求此官。魯國除了僭位立“太宰”一職,還設置“宗伯”、“司寇”:

文二年《傳》:躋僖公,逆祀也。於是夏父弗忌為宗伯,君子以為失禮。弗忌,宗人夏父展之後,當是世為禮官,至弗忌為宗伯則古卿官也。……宗伯為卿,而宗人特有司之事,則魯專命宗伯,非以司馬兼之,僭矣。

襄二十一年《傳》: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子為司寇,將盜是務去。”……侯國司寇之事,司空兼之,其下當置小司寇,今但曰司寇,且臧氏世卿,必非小司寇,大夫之職亦僭矣。¹¹⁸

諸侯不應有宗伯,宗伯由司馬兼之;亦不應有司寇,司寇則由司空兼之,但魯國卻專命夏父弗忌為宗伯、臧武仲為司寇,二者皆是僭制增置之官。

114 程公說:《春秋分記》,《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54,頁 5。

115 同上,頁 438。

116 杜預注,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正義》,《十三經注疏》,卷 4,頁 82。

117 程公說:《春秋分記》,《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54,頁 446。

118 同上,頁 446—447。

中唐史家杜佑(735—812)《通典》曰：“夫行教化在乎設職官，設職官在乎審官才，審官才在乎精選舉，制禮以端其俗，立樂以和其心，此先哲王致治之大方也。”¹¹⁹制典規模不僅環環相扣，也皆與國政興廢有關，而職官建置涉及“名實”，是維護邦國秩序最基礎的環節。除了魯國官制多有僭越，晉國官制更是“僭禮敗度，尤不可訓”。¹²⁰《職官書》晉國“大師大傅”條目下引《左傳》文公六年：“趙盾將中軍，始為國政，既成，以授太傅陽子與大師賈佗，使行諸晉國以為常法。”程公說曰：

按《周官》三公：太師、大傅、大保，論道經邦。三孤：少師、少傅、少保，貳公弘化，貳言副之。晉，侯國不應有孤卿，又稱大師大傅，則公而非孤矣。……大抵晉建官置軍，僭佚為多，卿無常員，復僭天子三公之名而假曰孤卿。¹²¹

晉國不應有孤卿之名，如顧棟高所言：“晉置孤卿已僭，而有二孤，尤非禮也”，¹²²更何況還僭擬三公之名，刻意逾越周制常法。其他像侯國基本的司徒、司馬、司空三卿，晉國既廢司徒，改為中軍；司馬、司空也聽命於諸卿軍將，職務已非傳統王官的舊制內容，¹²³職官名實明顯僭竊妄改。

同理，《分記》的“年表”以諸卿為緯可以明白昭穆少長、世族起訖、職位易代等狀況，更能借諸卿年表考世繹事、推本得失。程公說曰：“嗚呼！余觀春秋邦國列官分職皆僭王制。……魯諸卿季氏莫彊，政權歸焉；晉之命卿以戎事，則政出於中軍；宋之命卿主百官，則政出於右師。名號雖殊，所以為政一也。”¹²⁴列國諸卿擅權僭制，《魯卿年表》《晉卿年表》《宋卿年表》《鄭卿年表》皆表列呈現四國僭上之勢。或發明魯國重文物而以禮樂為僭，晉國重伯權而以軍制為僭；¹²⁵或直斥魯

119 杜佑著，顏品忠等校點：《通典》（長沙：岳麓書社，1995年），上冊，頁1。

120 程公說：《春秋分記》，《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54，頁438。

121 同上，頁452。

122 顧棟高輯，吳樹平、李解民點校：《春秋大事表》，卷10，頁1060。

123 程公說：《春秋分記》，《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54，頁453—454。

124 同上，頁79。

125 程公說：《春秋分記》，《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54，頁62。

隱公用公子翬帥師終啓亂階,¹²⁶晉文公因軍制而僭命卿爲始作俑者;¹²⁷或從魯國諸卿任事印證孔子言:“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¹²⁸從宋國官制典章呼應孔子語:“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之嘆;¹²⁹或循鄭國所任世卿之賢否,扣緊與國家興替的關係。四篇諸卿年表皆由世嗣宦族之本末總攬政制張弛之因由,原始察終,窮厥事理,不流於形式的表名列文而已。

試舉《晉卿年表》爲例。其中細列軍制職位,逐次填上人名,讀者可全面觀察每位軍將身分與任職起訖,了解任免興替背後的史鑑思維。以下節錄文公初期的內容:

十二年	十年	十年	九年	八年	七年	六年	五年	四年	三年	二年	文元年
河曲之戰					晉宣公元年 後年今狐之	辛亥 八月乙亥 襄公				彭舒之戰	
趙盾					趙盾	狐射姑 又易以趙盾 傅呂宣子於 是始爲國政	且居卒			先且居	
欒克 杜注代 荀林父			欒穀先克 箕鄭父作	射姑	先克	易以狐 射姑	衰卒			代卻漆自 新軍帥而 佐中軍	趙衰
代箕鄭 卻缺			鄭 投大夫箕	軍居守 鄭以上 其鄭父先 都作亂	箕鄭						
代林父 史駢					荀林父						
代先蔑 欒盾					先蔑		殺卒				
代先穀 胥甲			殺大夫先都		先都		胥臣卒				

圖四 程公說《春秋分記》《晉卿年表》¹³⁰

126 程公說:《春秋分記》,《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54,頁53。

127 同上,頁62。

128 同上,頁52。

129 同上,頁70。

130 同上,頁63。

表格文公五年到七年之間，“中軍”本為先且居，待五年先且居卒，六年又換成狐射姑，同年又變成趙盾，狐射姑改調為“中軍佐”，七年先克又取代狐射姑的位置，箇中變化非常清楚。程公說補充《左傳》“宣子於是始為國政”之語，提點讀者文公六年是一樞紐。每位將領就任或卸職也清楚標注，如文公五年先且居卒、趙衰卒、欒枝卒、胥臣卒，接任者直接標人名，反之則標示“代某某”（多因大型戰役而更調將領）。某些事件若必須交代因果得失，《分記》則會在表格後附上案語或前人觀點。像文公六年末就援引孔穎達語，述及晉國三易中軍導致箕鄭之徒作亂，之後又發生趙盾弑靈公、中行偃弑厲公，開端肇始於晉襄公任命元帥卻頃刻改易，其所由來漸矣。¹³¹ 讀者檢視表格再配合孔氏語，正可理解文公五年到七年“中軍”異動的影響，並連結至文公八年到九年箕鄭父作亂殺害先克等人的原因。

再者，《晉卿年表》以晉文公因軍制而僭命卿，為六卿分晉的始作俑者；之後晉襄公任命元帥卻頃刻改易，“晉之亡形，實成於襄公”。¹³²《晉卿年表》側重“諸侯命卿”與國政的關係，而《征伐書》則著眼“軍制變化”與國政的統合：晉悼公時期，“凡六官之長皆民譽也，舉不失職，官不易方，爵不踰德，師不陵正，旅不偪師，民無謗言，所以復霸”；晉平公則車戰寢廢，“自是霸業既衰，戎馬不駕，卿無軍行，公乘無人，卒列無長”；至晉昭公縱有甲車四千乘，僅為一時之強，“文、悼之法亡，六卿專晉之形成矣”。¹³³ 最後在《晉世本》亦可看到程公說總結：

晉自曲沃伯初命以一軍為晉侯，至獻公作二軍，文公蒐于被廬遂作三軍，將佐皆卿官，合而為六，清原之蒐增為五軍，至景公僭天子六軍之制，卿官十有二，原其始僭，自文公始。是以晉國，天下莫彊，世為盟主。馴自平公，政在大夫，溴梁之會，大夫司盟，君若贅旒。然繼以昭公，六卿

131 程公說：《春秋分記》，《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54，頁 63。

132 同上。

133 同上，頁 422—423。

疆、公室卑，逮其末也，析為韓、魏、趙而晉亡矣。¹³⁴

一樣從軍制角度剖析晉國君權旁落之因，謂晉文公作三軍，卿官擔任將佐，導致日後君若贅旒，提舉諸侯之度“法莫詳於軍制”的鑑戒，呼應《晉卿年表》晉國重伯權而以軍制為僭的整體觀察。

五、結 語

當學者採取某一體例篩選、序列史事，很有可能在編纂之際就設立既定標準，不同的編纂方法也非單純地將史料素材重新串接，而是間接體現出他對文本的理解方式和學術視域。程公說《分記》採取“紀傳體”改易《春秋》《左傳》之“編年體”，透過“表”“譜”“書”“世本”，多元地反映春秋歷史的面貌，包含曆法、疆域、五行、禮樂、軍制、兵法、國政、王事、諸侯等內容，主題豐富，可謂“條理分明，敘述典瞻”，¹³⁵足以作為研究《左傳》的參考依據。

《分記》形式上藉由“年表”、“人表”經緯縱橫地載錄編年相屬的事跡，將參伍懸遠的人事統彙其中，不僅能繩貫春秋華夷動向，又可明白世族起訖、官制更迭、諸卿興替等各種分合張弛的變化。“世譜”、“名譜”整理春秋世族的源流續衍，梳理公子公族世系的本末強弱，井然銓次，衆而不亂。“書”則排比大量史料文獻，溯源春秋各個諸侯國的典章制度，呈顯治道的沿革興變。“世本”取自譜牒著作《世本》之名，載錄周天王與諸侯世代承傳與升降的狀況。規模龐大，自成理路，不僅擴展出自我的學術體系，也為傳統《春秋》學研究別創新格。

再者，程公說以胡安國《春秋傳》的經說為旨歸，同樣聚焦尊王、攘夷等大義，並以史體綰合深刻的經解義理。如《周天王內魯外諸侯年表》效法孔子以周正紀《春秋》，冠周為經，列國為緯，或是將《周天王》序於“世本”之首，列王子王族於“世譜”之先，皆具備維繫周統，發明尊王之義。“世譜”“名譜”亦寓有

¹³⁴ 程公說：《春秋分記》，《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54，頁 708。

¹³⁵ 同上，頁 2。

《春秋》明華夷之辨、詳內略外之法、慎男女之配等經旨，不流於形式的表名列文而已。這亦可顯現程公說高度依附《左傳》，大量綴比《春秋》《左傳》事迹，將麟經詮釋導向務實客觀的路線，有別於南宋捨傳從經漸盛的風氣。也因《分記》取材於《左傳》，體例仿於《史記》，自然上承《春秋》“聳善抑惡”的史鑑精神，寓託不少垂訓警惕的觀點。如諸卿年表以列國諸卿擅權僭制為鑑戒、《征伐書》揭糞德治與《禮樂書》高舉禮治的重要、《職官書》則強調建置職官需名實相符，這都是總結歷史經驗，成為治世資鑑的指導方針。

王明珂在《反思史學與史學反思》曾有學術主流和傾聽蛙鳴的比喻，謂荷塘裏存在著此起彼落的蛙鳴聲，我們容易被較為響亮的聲音所吸引，甚至只選擇傾聽其中一種蛙鳴聲，導致忽略整個荷塘的生態。¹³⁶南宋《春秋》學就是整個荷塘生態，但我們多注意如“解義體”的主流鳴聲，無意間忽視其他像是以新史體改編經傳的著作。程公說《春秋分記》利用“紀傳體”特點展現《春秋》經旨，與當代學風思潮對話，形成一套獨有的內在理路，並建構自我的學術體系，即使部分頻率與其他論著相符，但仍保持獨特一貫的節奏，在“說《春秋》者莫夥於兩宋”的學林中爭高競敏，¹³⁷創造出成一家之言的學術意義。

（作者：臺灣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

136 王明珂：《反思史學與史學反思》（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頁45、48。

137 紀昀、陸錫熊、孫士毅等：《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29，頁368。

引用書目

一、專書

- 王應麟：《玉海》。揚州：廣陵書社，2003年。
- 王鶴鳴：《中國家譜通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 王明珂：《反思史學與史學反思》。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
- 文天祥：《文文山全集》。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5年。
- 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
- 司馬光編著，胡三省音注：《資治通鑑》。北京：中華書局，1956年。
- 朱彝尊撰，林慶彰等主編：《經義考新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
- 多賀秋五郎：《中國宗譜の研究》。東京：日本學術振興會，1981年。
- 宋鼎宗：《春秋宋學發微》。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6年。
- 沈玉成、劉寧：《春秋左傳學史稿》。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
- 吳國武：《經術與性理：北宋儒學轉型考論》。北京：學苑出版社，2009年。
- 李建軍：《宋代〈春秋〉學與宋型文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年。
- 杜預注，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1982年，《十三經注疏》。
- 杜預：《春秋釋例》。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70年。
- 杜佑著，顏品忠等校點：《通典》。長沙：岳麓書社，1995年。
- 柳詒徵：《國史要義》。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年。
- 胡安國撰，錢偉彊點校：《春秋胡氏傳》。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
- 周康燮主編，存萃學社編集：《楊守敬研究彙編》。香港：崇文書店，1974年。
- 紀昀、陸錫熊、孫士毅等：《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
- 侯步雲：《北宋〈春秋〉學研究》。西安：西北大學歷史系博士論文，2009年。
- 姜義泰：《北宋〈春秋〉學的詮釋進路》。臺北：臺灣大學中國文學所博士論文，2013年。
- 高閔：《春秋集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51。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
- 晁公武撰，孫猛校證：《郡齋讀書志校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
- 徐日輝：《史記八書與中國文化研究》。西安：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

- 倉修良：《譜牒學通論》。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7年。
- 柴德賡：《史籍舉要》。北京：北京出版社，2001年。
- 馬端臨著，上海師範大學古籍研究所、華東師範大學古籍研究所點校：《文獻通考》。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
- 班固撰，顏師古注：《新校本漢書集注》。臺北：鼎文書局，1997年。
- 家鉉翁：《春秋集傳詳說》，《通志堂經解》，冊24。臺北：漢京文化事業公司，1985年。
- 陳厚耀：《春秋世族譜》，《叢書集成續編》，冊246。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年。
- 陳澧：《東塾讀書記》。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7年。
- 脫脫等撰：《宋史》。臺北：洪氏出版社，1975年。
- 程公說：《春秋分記》，《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54。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
- 程發軔：《春秋左氏傳地名圖考》。臺北：廣文書局，1969年。
- 程發軔：《春秋人譜》。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0年。
- 楊果霖：《〈經義考〉著錄“春秋類”典籍校訂與補正》。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13年。
- 陽平南：《〈左傳〉叙戰的資鑑精神》。臺北：文津出版社，2001年。
- 齊履謙：《春秋諸國統紀》，《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59。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
- 趙鵬飛：《春秋經筌》，《通志堂經解》，冊20。臺北：漢京文化事業公司，1985年。
- 趙伯雄：《春秋學史》。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04年。
- 歐陽修著，李逸安點校：《歐陽修全集》。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
- 歐陽修著，洪本健校箋：《歐陽修詩文集校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 錢大昕著，陳文和、孫顯軍校點：《十駕齋養新錄》。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
- 錢鍾書：《管錐編》。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
- 戴維：《春秋學史》。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4年。
- 顧炎武著，黃汝成集釋，樂保群、呂宗力校點：《日知錄集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 顧棟高輯，吳樹平、李解民點校：《春秋大事表》。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

二、論文

- 金生楊：《理學與宋代巴蜀〈春秋〉學》，《四川師範大學學報》2006年第5期，頁133—137。
- 張尚英：《試論宋代〈春秋〉學的地域性與階段性》，《宋代文化研究》第22輯（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16年7月），頁194—203。
- 康凱淋：《原情達權：趙鵬飛〈春秋經筌〉的解經方法》，《臺大文史哲學報》第95期（2021年5

月),頁 1—37。

勞思光:《儒學辭典詞條》,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勞思光先生存稿整編》,http://phil.arts.cuhk.edu.hk/project/LSK_mss/? p=1131,2022年3月21日訪問。

The Academic Orientation of Cheng Gongdui's *Notes to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Kang, Kai-lin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Chung Hsing University)

Abstract

In the Song Dynasty, there were many works written in the new historiographic style adapted from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Among these works, the most complete and comprehensive compilation is Cheng Gongdui's *Notes to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because it contains the largest number of fascicles and the most abundant topics. However, insufficient attention has been given to the general trend and academic significance of rubric adaptation. Therefore, this paper is intended to be the first to investigate Cheng's book with a focus on its compilation rules, commentaries, and the education function of history. This paper takes the Theories of Emperor Respect in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as an example to verify that *Notes to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not only reflects the people and events in *The Zuo Commentary* and plays a role in the annals of history, but also extends the interpretation and enhances it by adopting a variety of commentaries and styles, as well as seeks to enlighten the sages' purposes. The paper concludes that *Notes to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inherited the interpretation system of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but forms a unique internal theory closely related to other commentaries and constructs a tree-shaped and symbiotic academic domain.

Keywords: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Zuo Commentary*, Cheng Gongdui, biographic style, historiography